

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修订本)

蒋英炬

吴文祺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蒋英炬 吴文祺 著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修订本)

張政烺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 蒋英炬, 吴文祺著. -- 修订本.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102-06611-0

I. ①汉… II. ①蒋… ②吴… III. ①石刻文—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7.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0536号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编辑部: (010) 56692088

发行部: (010) 56692181



选题策划 吕 寰

责任编辑 吕 寰 白劲光

装帧设计 吕 寰

版式设计 张俊岭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启恒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14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4.5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6611-0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0年以来，策划推出《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旨在收入改革开放以来艺术与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名家名作，收集、整理、再现经典，打造艺术与学术并重的经典文库。现已收入有：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张守中《中山王罍器文字编》、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李均明《汉代简牍研究》等。这些著作或是总结性的或是阶段性的，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较大影响，有较大的专业读者群。基于《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对武氏祠的建筑配置复原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现将其纳入《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系列，以飨读者。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是蒋英炬、吴文祺两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完成的个案研究。这是对武氏墓群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考古学调查，成为后来所有武氏墓群及祠堂画像研究的基础。《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第一次出版时间为1995年，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距今已二十余载。由于出版年代较早，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大部分插图被删掉，使得读者很难得观全面的图像资料。老书新做，经典焕新，我们投入较多的精力精心编入了所有武氏墓群的资料，最大程度地还原武氏祠的本来面目，以便于进一步对其对照、检验和研究。

图像的补入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为照片图版，这些照片都是当年著者做考古复原工作时所拍摄的一手资料，补图如下：武斑碑阴题字、武荣碑阴题字、“无字碑”题字、武梁祠石壁外面花纹、1号墓前室叠涩室顶、1号墓前室内景、“祥瑞图”残石、东北墓间画像石、蔡题一石、蔡题三石、舞蹈画像石、翁方纲《重立汉武氏祠石记》、李东琪题《武氏官职名号碑》、钱泳题记、陈锦《重修武梁祠石室记》、丁敬书“武氏石室”。第二部分为本书第五章“祠堂画像内容”，补图如下：西阙第一幅至第十九幅、东阙第一幅至第十九幅、武梁祠第一幅至第六幅、前石室第一幅至第十九幅、左石室第一幅至第十六幅。由于年代已久，著者手中原拓本已佚，因此该部分的增补，采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山东汉画像石，蒋英炬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图版，共79幅。另外加入“武梁祠二（东壁）上列右端画像与武梁祠一（后壁）上列左端画像”线稿一幅。

对文本的编校，则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不作改动。仅有“第四章”中“三、配置结论”部分，倒数第二段，“武梁祠石壁的外面磨光并刻有花纹边饰”后加入“说明武梁祠是独立存在于地面上的，人们可以在其四面绕行观看”，由著者补入。

此次编纂，对所引文献及校注做了版本校对。因原著作没有对所用版本做标注，此次校对，遵循原有体例，主要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本子为依据，经著者同意，在注释中对所引文献进行了直接的校改，在此并将所用文献版本注明，文中不再一一标示。文献来源情况如下：

- (战国)《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春秋)《晏子春秋》，北京：商务出版社，1919年。
-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汉)《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汉)刘向：《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汉)班固：《白虎通》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汉)戴德撰，庠辨注：《大戴礼记》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汉)王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梁)萧统等辑，《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汉)应劭：《风俗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晋)郭璞注，(清)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晋)郭璞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晋)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南朝)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南朝)沈约：《竹书纪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唐)冯贽：《云仙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宋)赵明诚：《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宋)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修武氏祠堂记略》，(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 《前后左右石室画像跋》，(清)方朔：《枕经堂金石题跋》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九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 (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九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 (清)冯云鹏、冯云鹛辑：《金石索》，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 阮元校刻《论语》，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阮元校刻《周易》，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阮元校刻《尚书》，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阮元校刻《诗经》，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王重民：《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 〔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京：国书刊行会，1972年。

最后，要郑重感谢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考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岩先生，是他热忱向出版社推荐，才使此书得以重现。还要感谢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考古学博士生徐胭胭女士，是她对此书做了细致的文献校注、版本的校订。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吕寰

2013年11月6日

再版序言

趁本书再版的机会，我想絮叨一下有关的事情和想法，也望有助于读者对本书及再版的了解。

1963年春天，我去嘉祥参加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氏墓群石刻的文物保护工作，初次实地接触到武氏祠画像石。那年正巧遇到前辈顾铁符先生也从北京来，他随身携带了一本《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其中刊载有王世襄先生翻译的美国费慰梅（Wilma Fairbank）著的《汉代“武梁祠”原形考》一文，我便借来阅读。费文开篇就指出：武氏祠画像石拓片虽广为中西著录和学人研究，但都是对“雕刻中的题字”和“动人的故事”感兴趣，而对武氏祠情况最为重要者竟被忽略，“最显著的疏忽是对于基本问题的忽略，例：何谓武梁祠？墓地的原状若何？现在杂处的石块当初在建筑上的配置为若何？各种画刻彼此的关系若何？关于以上诸问题的答案，纵使人偶然涉及，但是对于石室详慎的复原工作，据笔者所知尚未有人尝试过”。费氏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又觉得这种书不易借到，一时兴起，便约人日夜不停将全文抄录下来。因为手下无洁净的白纸，文章是抄写在油印用过的背面纸上的。那年在现场工作时间不长，主要做一些记录和划出保护范围，没有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考察，而武氏祠画像石的问题连同那个手抄本，从此后在我心中潜藏下来。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冬，我刚从农村劳动回来，有幸参与一项编著山东汉画像石图录的任务。当时我就考虑到，武氏祠画像石虽然重要，但过去多有著录，再作那种零散状的重复著录没有意义，所以就主要选择那些过去未曾专门著录或新发现汉画像石编成选集。在两年多的工作过程中，到各地接触到许多零散的汉画像石，在新的收获之余，又有对资料零散、孤立或残缺之憾，使我更加感到对武氏祠画像石有重新考察和整理的必要。于是，当编著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的事一脱手，我便邀同伴奔赴嘉祥，对武氏墓群石刻做实地考察了。当然，我是带着那个幸运未被丢失的费氏文章抄本前往的，它终于帮我把心中潜藏的武氏祠画像石建筑复原问题付诸实现。

在对武氏祠画像石的考察工作开始时，甚怕对资料的掌握欠缺、遗漏，我们曾去北京等地查找有关武氏祠的文献资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予抄录。而当阅读了许多金石文献著录后，一些问题却被弄得更糊里糊涂。因为这些著录缺乏实地考察，有些往往是依据辗转收集到的拓片，这种缺陷迫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现场考察实物的重要性。一定要仔细对照实物，梳理清楚，辨明对错，准确弄清武氏祠画像石的来源、数目、形制、大小等真实情况；尤其是对费氏复原的得失检验，得出正确的复原结果，也主要是依据考察画像石实物状况完成的。

回想对武氏祠画像石的祠堂建筑复原考察，实非一帆风顺。这里举个小例，一块未被著录的“花纹条石”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见对资料的取舍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初次完成诸祠堂复原并写成论文寄出后，当时曾留下个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左石室四”、“左石室五”二石没有配置复原进去，虽已知费文对二石复原有错，但我们也无法正确复原上去，因为将此二石配置在左右石室后壁下面后，要比其他三壁的石块下部长出一段，这段石头刻的花纹边饰又为其他石块下部所没

有，无奈只能把它排除放在其余画像石中了。可是，这明确属于“左石室画像”一组的石头，怎么就配置不进左石室中去呢？这个悬疑总是纠结在心头。大约几个月以后，一天独自坐在那存放武氏祠画像石的大屋中，面对着那一块块的画像石发愣，忽然灵机闪现，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它——数年躺在那里、整天被熟视无睹的一块“花纹条石”，像从天而降呈现面前。我马上拿钢尺去测量，这块“花纹条石”的上下高度和花纹样式，都和“左石室四”、“左石室五”下部的花纹边饰完全等齐一致，把“花纹条石”作为下部的基石铺上后，三壁的高度和下面的花纹边饰也都平齐一致了。这样，不论从三面墙壁的花纹边饰的联系，还是从石块配置的建筑结构，都得到正确合理的检验。至此，心中的悬案总算石头落地，当年黄易等人掘出的武氏祠堂画像石都得到了确切的配置复原。金石著录所取的拓本往往都舍去花纹边饰，对这种全无画像只刻花纹的石块不作著录毫不奇怪。幸亏的是这块作基石用的“花纹条石”保存了下来，若不然，我们这次复原又将留下了错误和难解的疑案。

本书的出版也历经曲折，由于种种原因失去良机，而后在出版时删去了许多图像资料。鉴于上述的经验教训，这次再版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支持下，补充和完善了图像资料，目的即是较全面完整地著录与反映武氏墓群石刻，以便于进一步对其对照、检验和研究。举两幅图例说明：一幅是“武梁祠一”（后壁）外面的花纹，通过图片可进一步证实武梁祠的外壁是在磨光石面上刻有花纹装饰，它和前石室、左石室外壁凹凸不平的粗糙石头不同，说明这些祠堂在墓地上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再一幅是“楚昭贞姜”故事画像的插图，通过补图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完整的故事画像被刻在“武梁祠一”（后壁）和“武梁祠二”（东壁）两块石头上了。以往的著录和研究只把“武梁祠一”上有榜题“楚昭贞姜”的故事认识了，而把“武梁祠二”上的一段有榜题“使者”的画像当作另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画像。数百年来对此考释争论不休，此前我也曾被这些文章弄得晕头转向。当武梁祠复原后便得知，此故事画像正处于祠堂东壁与后壁相接的转角处，两段画像的位置平齐相接，珠联璧合，从内容到形式构成一幅完美无缺的故事画像。从此故事图例不仅可认识到过去金石学著录研究的局限，更提示我们对画像资料的研究方法，要注意到它的真实性、完整性等情况，不然的话，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制造错谬。

由上所述，我也谈点积累的看法。传统金石学是一块一块石头或一幅一幅拓片收集、著录、研究汉画像石的，也惯于从总体上这样孤立、零散地看待和认识汉画像石，现在仍有人沿袭着这种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对它本来面貌的认识和追求。考古学或美术史虽然沿用了“汉画像石”这一名称，但必须赋予它考古学的概念和方法。汉画像石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它原来是附属于墓室、祠堂、阙等建筑物上的构件，考古学所面对的汉画像石实物标本（资料），虽然也包括一块一块的画像石，而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汉画像石构成的整体与本来面貌，如果脱离或遗忘了这个目标，只孤立、零散地看待或研究汉画像石，那就等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有砖瓦而不知有楼房了，其概念和意义就相去甚远。通过对武氏祠画像石的考察研究，我们更感到当年费氏所指出的问题是一箭中的，其见解、方法有先见之明。完成对武氏祠画像石的建筑复原后，不仅可以较完整地看到祠堂的原貌，不同的结构、形制，诸画像石的建筑配置和画像布局关系，而且由此更加深了对画像石作为建筑物构件的性质与特征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我便从嘉祥宋山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为后代墓所利用），发现识别出已不存在的汉代墓地小祠堂，以及对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所构成的石椁墓作了复原等。此后扩而大之，就陆续认识到在鲁苏皖豫地区的汉画像石中存有大量的属于石椁墓或小祠堂的构件。由于画像内容和画像石在建筑上的配位和布局往往有联系，

这就更便于认识这些画像石的内容和由它构成的建筑物本貌。不论如何，只有正确认识画像石原来存在的本来面貌和画像石内容的本来意义，才能对其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为诸多学科提供科学合理的图像应用与研究资料，此也是本书再版心向往之的目标。

本书得以再版，全靠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同道友人的慧心关照与鼎力支持。其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吕寰女士，给予许多具体指导和帮助。这次再版虽对文字内容少有更动，而增补的插图与图版等资料以及整书的重新编排，全部是由编辑同志完成的。笔者亦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又受家境等条件限制，甚感心力不足，遇此善助怎不快慰人生、由衷高兴呢？在此向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帮助玉成此事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还望广大读者与贤明人士批评指正，以推动学术进步。

蒋英炬
2012年夏

绪 言

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是我国东汉时期武氏家族墓地的一组较完整而有代表性的石刻画像建筑群体，属于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群石刻现在保存有双阙、一对石狮、两方武氏碑和零散的祠堂画像石，即“武梁祠画像”和根据武梁祠的位置掘出后定名的“后石室画像”、“前石室画像”、“左石室画像”^[1]。另外，还有一些以后增补进来的其他汉画像石以及清代人为武氏祠堂立的碑刻题记。因为武梁祠画像发现和著录最早，所以武梁祠的名称久已蜚声中外了。

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已有武氏碑刻的记载。武梁祠画像则最初著录于赵明诚的《金石录》^[2]，洪适又录其文于《隶释》，摹其图像于《隶续》，并始以“武梁祠堂画像”名之^[3]。至清代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黄易等人掘出了武氏诸祠堂画像石，时值金石学兴盛之际，一下得到这么多的汉画石刻，“画像古朴，八分精妙”，更引起金石学家的重视^[4]。以至竞相传拓，著录于书，广为流传，并相继沿用了“武梁祠画像”这个以一概全的名称^[5]。千百年来著录繁多，或录榜文，或摹图像，或述内容，或考故事，或作题跋，将武氏祠画像和榜题文字著录于书者不下数十种^[6]。其中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对画像内容记述较全，冯云鹏、冯云鹗《金石索》对图像摹录较多，并有瞿中溶《武梁祠画像考》、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等专书著录。

传统的金石学对武氏墓群石刻画像著录虽有一定成就，但也有其局限和缺点。由于缺乏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它多集中注意于画像榜题故事内容的考证与描述，或品评画像拓本的优劣完缺，而不注意对画像石刻原物的考察。对画像石构成的建筑形制如双阙，尤其对那零落散乱的祠堂画像石在建筑上的配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则忽略了，更不要说未能涉及画像石刻艺术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基于这种倾向，以往的许多著录只知记录有画像内容的画幅，而不追究这些刻画的石头，有些材料被遗弃，各家著录的画像幅数和刻有画像的石头数也混淆不清；或只凭辗转到手的画像拓本，所录材料片断不全。再者，旧时金石书的图像著录皆为摹刻^[7]，画像往往走形失真；有的又只有文字记述，而无图像附录^[8]。自近代摄影印刷行世之后，中外著录也有不少施之于武氏祠画像者^[9]，但所录图像仍沿旧序，只当作零落散乱的画像对待，材料的错乱和遗漏仍然屡见不鲜。如此等等，对武氏墓群石刻缺少综合、系统、完整的著录，不能反映出武氏墓群石刻的原状和整体面貌，因而，也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一点，随着近代考古学的进展，也为人们所注意。所以，当容庚先生的《汉武梁祠画像录》一问世，由于沿袭旧的金石学，就受到了当时学术界人士的批评^[10]。又如叶瀚的《中国美术史》，根据四组零散的祠堂画像石考订了祠堂的主人，除武梁祠外，“前石室画像”为武荣祠，“左石室画像”为武斑祠，“后石室画像”为武开明祠。以后对武氏祠的著录和介绍多引用此说，实际上它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因为传统金石学所分的四组零散的祠堂画像石，并不是证明实有的四个祠堂。以致今天，对武氏墓群石刻这一重要文物资

料，仍缺乏准确的认识。

由上述看来，对武氏墓群石刻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研究，编著一部较完善的著录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到现场进行了详细考察，结合文献记载首先弄清楚画像石的来源、数目、准确尺寸和形制特点，对零散的祠堂画像石作了建筑配置研究，得到了基本成功的复原^[1]。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对武氏墓群石刻的阙、狮、碑、祠堂的形制、画像内容、榜题文字等做一系统的著录，并将考察过程中在武氏墓地上发掘清理的两座墓葬配合发表。本书力求以文图并举来编纂，如双阙，先考述其建筑形制，再按建筑部位顺序介绍画像内容；在图形方面，有照片和建筑实测图，又有用拓片配置的阙的四面画像正视图，文图对照，可以对阙的整体和具体部位都有全面了解。对祠堂画像石先进行配置复原，再按照每个祠堂的部位顺序介绍画像内容，图文相配也如双阙。部分画像以原石拓本制成图版，全部画像中的榜题文字（缺失者以文献资料补入）又单独拓出制版，以便进一步了解祠堂的画像内容。编著此书时尤其注意了诸祠堂画像的整体布局及其相互关系，整理资料所取的拓本，是按画像石面的大小铺满纸全部拓印，不仅把花纹边饰拓齐，还可见原石面全貌。用这种拓片（缩成比例一律的照片）按祠堂的复原部位配置起来制成图版，不但可以看到祠堂画像布局全貌与各幅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可用来进一步检验证实祠堂画像石的建筑配置关系。另外，这次还发现补充了过去遗漏而从未著录的武氏祠堂画像石，对个别实物资料缺失者，又利用文献记载和旧拓本补入，也是对这群石刻文物的过去与保存现状的一次历史记录。

在编著此书时，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对多数已知的和这次新辨定出的画像故事内容，不在正文内作繁复考证，而将记载该事的文献列入注释中。对以前著录的错乱、遗漏，需要时给以校正指出，但在画像内容方面不能一一累指，只按照画面作符实的记述。将我们整理研究武氏墓群石刻的一些管见，也略作陈述。除此绪言外，本书共成文八章，另将以后增入与武氏祠没有配置关系的汉画像石以及清代立的碑刻题记，作附录一章于后，奉献大家以资博览、研究，更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注释】

- [1] 据清代乾隆年间黄易发掘武氏祠堂画像石时，先“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武梁石室后东北又一石室”，名为“武氏后石室画像”；“其前又一石室”，名为“前石室画像”；又“左石室画像”得于“武梁石室之左”。见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文载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五；《前后左石室画像跋》，文载方朔《枕经堂金石题跋》卷二。
- [2] 《金石录》卷十九：“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按赵氏所说的古圣贤画像有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正为武梁祠画像内容；又所指“画像五卷”，也正合武梁祠三壁和两屋顶的五块画像石。见本书第四章武梁祠的建筑配置。
- [3] 《隶释》卷十六：“予案任城有从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辞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匠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谓此画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画像名之。”
- [4] 黄易在《修武氏祠堂记略》中说：“汉人碑刻世存无多，一旦搜得如许，且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可谓生平

奇遺。”

- [5] 最早见于著录的武梁祠画像，只是武氏诸祠堂中的一座，就各祠堂的画像石而言应称为“武氏祠”，就武氏墓地上遗存的整体文物来说，应称“武氏墓群石刻”。
- [6] 参见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第八章《武梁祠画像著录表》。又以后的各种美术史等，也对武氏祠画像进行了著录。
- [7] 如（宋）洪适《隶续》，（清）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王昶《金石萃编》，（清）冯云鹏、冯鹗《金石索》、（清）瞿中溶《武梁祠画像考》等，皆为摹刻图像。
- [8] 如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虽是对武氏祠画像记述较全的书，但只有文字而无图像。
- [9] 如〔法〕沙畹《中国两汉时之石刻》，〔日〕关野贞《支那山东省汉代坟墓の表饰》，〔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附图，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附图，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等，皆据画像拓本缩影印刷。
- [10] 孙次舟：《汉武梁祠画像一二考释》，《历史与考古》第三回，1937年。按此文中对画像故事内容的具体考辨，现在看来也不确。其所以导致一而再的错误，正暴露了原来金石学著录的缺陷。但该文指出容书不出原金石学考据的圈子，其文后附藏云先生对容书的批评，希望“作进一步之实地考察，将其现在情况，全部详加测量”等方法，无疑是正确的。
- [11]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2期。该篇主要内容将收入本书第四章，个别缺陷又予以补正。

目 录

第一章 武氏墓群石刻的历史概况	1
一、地理环境	1
二、武氏墓群石刻的建立	3
三、武氏墓群石刻的发现与保护	4
第二章 石阙和石狮	7
一、石阙建筑形制	7
二、石阙画像内容	9
三、石狮	13
图版	15
第三章 武氏诸碑	47
一、武梁碑	47
二、武开明碑	48
三、武斑碑	48
四、武荣碑	50
五、无字碑	51
第四章 祠堂画像石建筑复原	53
一、武氏祠画像石数目和著录、保存状况	53
二、祠堂画像石建筑配置	62
三、配置结论	73
图版	78

第五章 祠堂画像内容	85
一、武梁祠	85
二、前石室	91
三、左石室	99
图版	116
第六章 对武氏祠画像的几点认识	159
一、关于祠堂画像的布局	159
二、关于祠堂画像的题材内容	161
三、对几种画像内容认识的启示	163
四、关于祠堂的主人	167
第七章 略说武氏墓群石刻艺术	173
第八章 武氏墓地的两座石室墓	179
一、一号墓	179
二、二号墓	184
附 录	187
一、其他汉画像石	187
二、清代为“武氏祠堂”立的碑刻题记	189
图版	195

第一章 武氏墓群石刻的历史概况

一、地理环境

武氏墓群石刻，在山东省西南部的嘉祥县城南十五公里武宅山^[1]北麓，从县城向南由公路通纸坊集，然后再向东南行约三公里即到该地（图1.1）。

武宅山是一座西南、东北向的小山丘，两头高，中间凹，像一个马鞍形。山坡北面有一个村庄，名字也叫“武宅山”。村子的西北部，在竖立双阙和当年出土祠堂画像石的武氏墓地上，现有一所石砌围墙，院内中央有座高大的灰色瓦顶房屋，著名的武氏墓群石刻就收藏在这里（图1.2）。

武氏墓地因其所在的地势，南面不远就到了山脚，西北方向则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因而整个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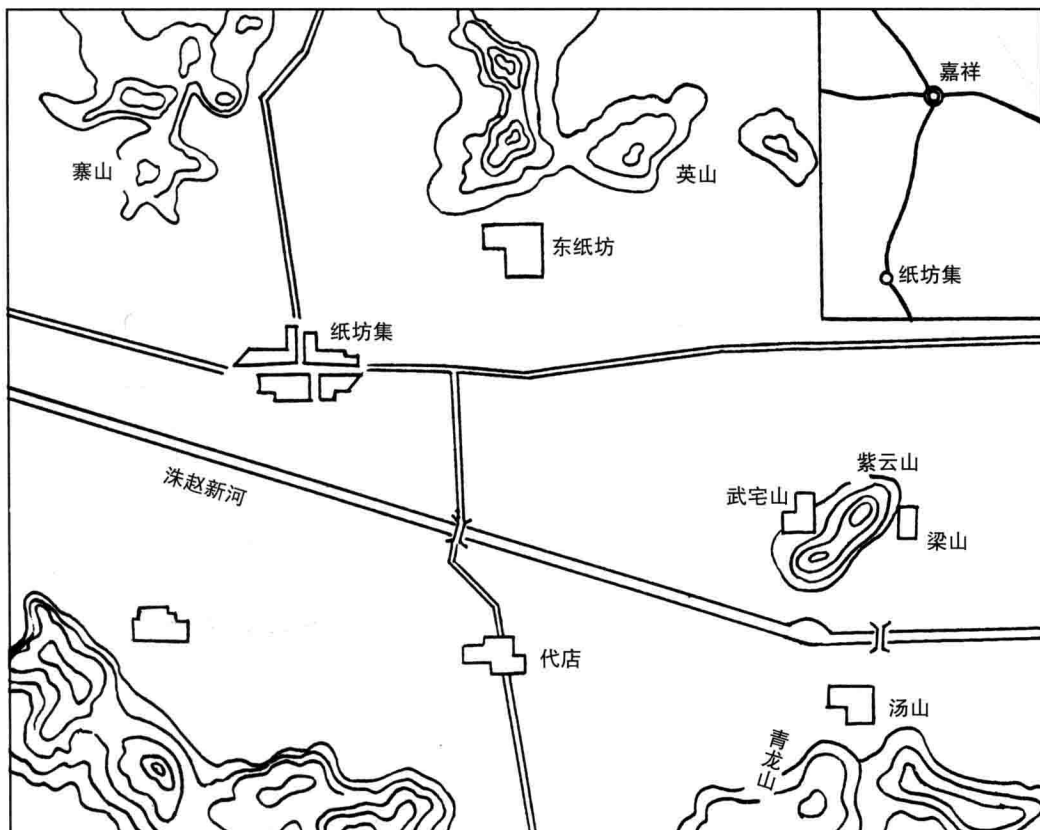


图1.1 嘉祥武宅山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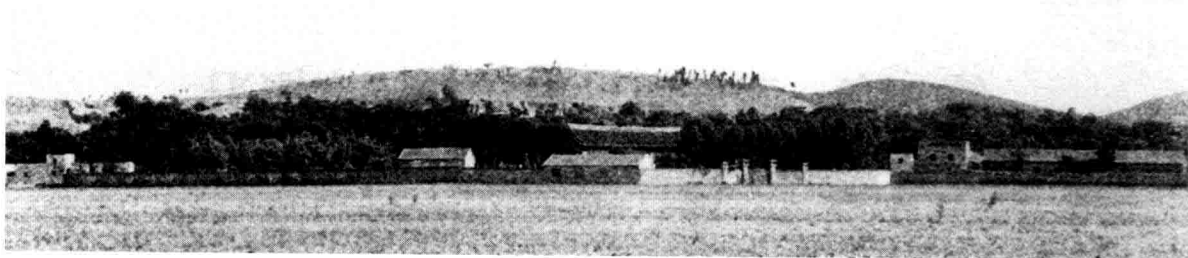


图1.2 武宅山村外景（自北向南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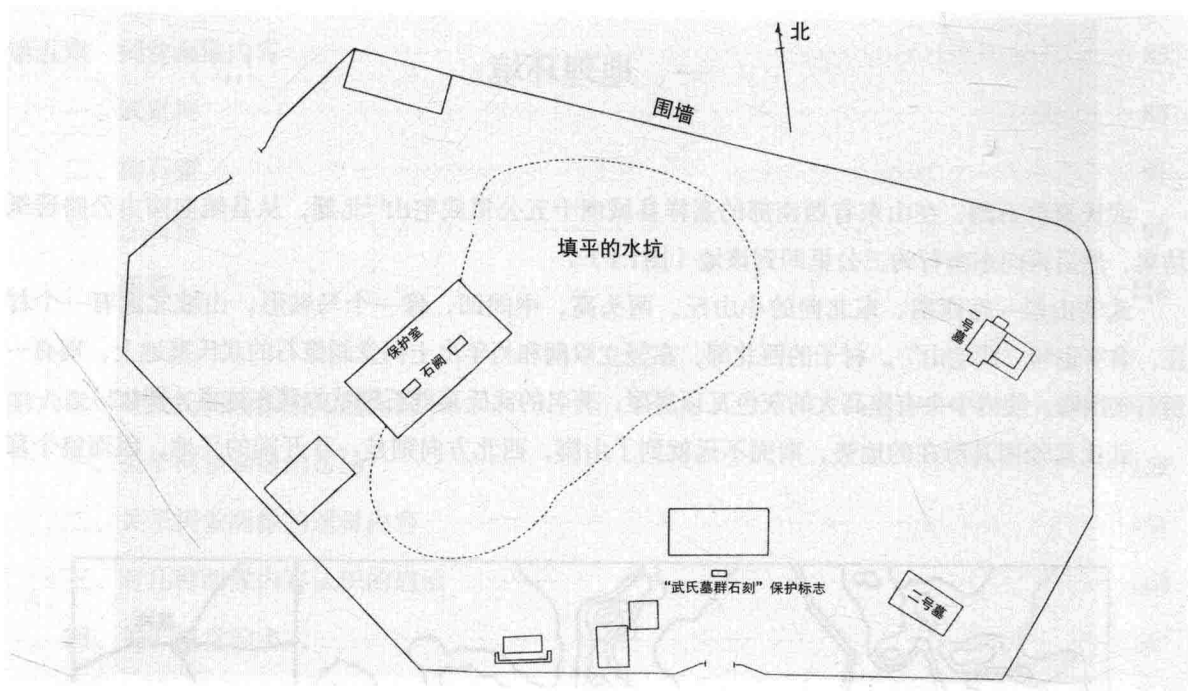


图1.3 武氏墓群石刻保护范围平面图（1981年测绘）

地背依武宅山面向西北（图1.3）。至今在原地保存的墓地神道口的双阙，就是明显的标志。阙前两侧，立着一对石狮。在双阙的东南面，是清代发掘出武氏祠堂画像石的地方，过去是个积水的大坑，现已被填平。再向东南一点，就是武氏的墓葬了。在院子的东部，有座一公尺多高的土台，上面长着些树木，即是残存的武氏墓冢（图1.4）。古代就称此地为“武家林”^[2]，近代当地人又讹呼为“皇林”。可以想见东汉时期的武氏家族墓地，神道口双阙耸立，阙前有一对威武的石狮守卫；进入神道内，石碑挺立，祠堂错落，累累土冢，广种松柏，背依着那郁郁葱葱的山丘，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武氏墓群石刻所在的嘉祥县，是金代皇统年间初置^[3]，东汉时期无此县。过去著录都指嘉祥县的武宅山在东汉时属任城国地。按武宅山的位置，向南已接近金乡县境。据《后汉书·郡国志》，汉代置有金乡县，属山阳郡。《山东通志》卷三十五《古迹二》：“金乡县故城在县（指嘉祥县）南四十里，后汉置县，属山阳郡，今为阿城村。”《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的金乡县故城位置也同此说^[4]。经我们调查，在武宅山南边约十里的阿城村，确有一处小型的汉代城址，当为金乡县故城。又据1963年在嘉祥县城南大鼎山前发现的范式墓^[5]，位于武宅山的北面约六里。《后汉书·独行传》载：“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范式的墓地当属金乡县，而位于范式墓之南距金乡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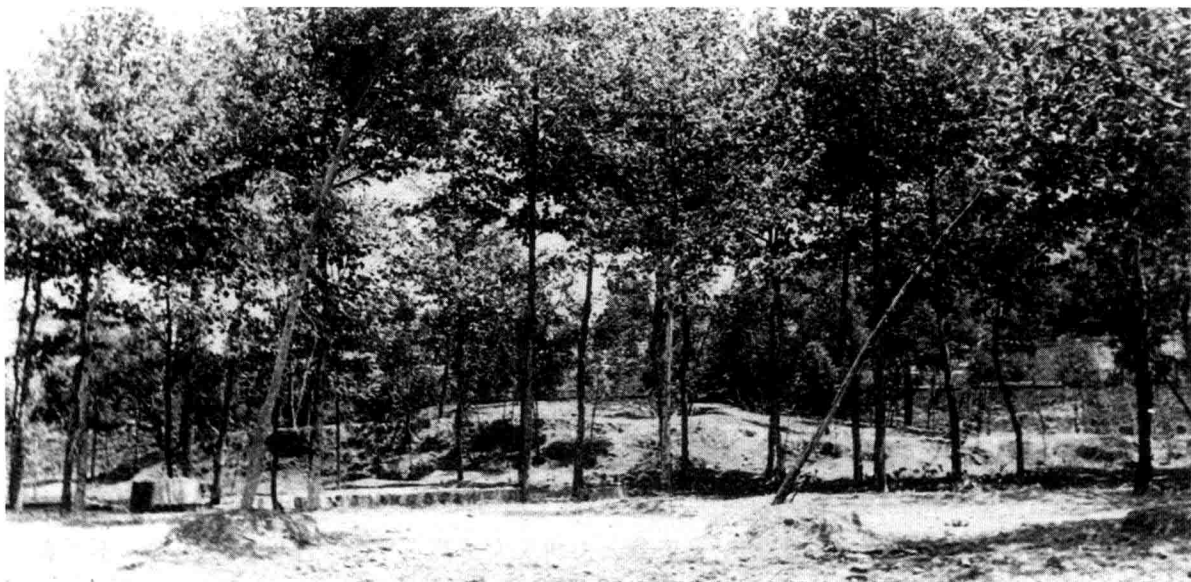


图1.4 武氏墓冢（一号墓）

治更近的武氏墓地，东汉时期属于山阳郡金乡县是无疑了。此说确立，东汉时期的武氏家族，也系山阳金乡人。

二、武氏墓群石刻的建立

东汉武氏家族，史籍并无记载。根据武氏墓群石刻中的阙铭和碑文记载^[6]，提到武氏家族的四代成员有：母；四子武始公、武梁（字绥宗）、武景兴、武开明；武梁的三个儿子仲章、季章、季立；武开明的两个儿子武斑（字宣张）、武荣（字舍和）；武梁的孙子子侨。其中立碑记载并出仕为官者四人：武梁官从事，武开明官吴郡府丞，武斑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吾丞。在朝廷说来，这是一般的中下级官吏，但在地方，武氏世代为官，也算势力煊赫、家财宏富的官僚地主了。所以，在武氏家族的墓地上，才有条件建立起这样华丽壮观的石刻建筑。

在上述的武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死去的是家族中最长者母，及家族中青年有为官居敦煌长史的武斑，祖母和孙子两人都死于东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7]。阙铭及碑文中都未提到武始公兄弟四人的父亲，可能在武氏家族成员未出仕发迹之前早就去世了。武氏墓群石刻最早的一组建筑，是墓地神道口的石阙和石狮，据阙铭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此可以看出，当其母死后，孝子武始公等兄弟四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共谋为其家族墓地建造石阙。与此同时，又值武氏家族中最值得炫耀又最痛伤的武斑壮年夭折，所以在阙铭的后段特作记载。就在建成石阙的同年，武斑碑也立制起来^[8]。

又据碑文记载，武开明死于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即石阙建成后的第二年；武梁死于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武荣死于桓、灵之际，约当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9]。其他人的死年不详，根据武荣是武始公兄弟四人最少弟的次子，推断当武荣死后，上述武氏家族中其他的人也多已去世了。如果在他们死后刻碑立祠，武氏墓群石刻则主要建造于东汉桓、灵时期（公元147—189年）。